

# 中国的外部困难和新领导人面对的挑战：

## 国际政治、对外政策和台湾问题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撰写之际，离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还有近一个月时间，离开将由这次大会和随后中央全会产生的中共领导层有足够全面、明确成型的治国表现大概更是经年累月，以致目前还不能对它们表现做出可靠的总体预计。出于广大中国公众和国外舆论迟至今日仍不免猜测、估计和议论的种种原因，人们甚至还不太能很有把握地预期十六大确实会实现“换代”，即“第四代”领导人从“第三代”领导人那里接班，而那是一年多以前被广泛认作当然而极少遭到怀疑的。因此，现在要讨论新领导人的基本治国方略，包括其对外政策和对外政策，实际上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这至少是因为我们至今甚至无法真正肯定中国共产党即将有一位新的最高领导人，连同确实新的最高层决策班底。

不仅如此，即使“第四代”在今年底和明年初先后出任中国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也仍然有一些惘然或困惑的因素，使人难以颇为可靠地勾勒出一幅如此的中国未来国策草图：它虽然不可避免地比较粗略、但仍然展示出它们的新的重大特征。首先，有一切理由可以认为，在此后一个相当长时间内，就几乎所有头等重要的决策而言，现在的最高领导人大概仍将直接或间接地试图发挥、而且肯定往往能够发挥终极的决定性影响。其次，即使在可能设想的最好情况下，“第四代”最高领导也必定需要经过五至六年，才能真正牢固地确立起为了展示和实施新的治国方略必需的足够权势基础和个人权威，如果他有这样的治国方略的话（当然其“新”的程度和范围至少在起初几年里大多必定相当有限）。在这一方面，他面临两项大概特别重要的不利因素：（1）“第四代”领导层内很可能将有如此有力的人物，其实际的权势资源和政治技能似乎不亚于他，而在政治精力方面肯定超过他；（2）他在国家军事、外交和经济管理三大关键领域担任领导职责的经验很有限，这除了必将使他面临在这些领域内颇长的学习过程和颇重的学习任务外，还增大了他依靠别人、因而与之分权的必要，而这些人中间难免有其实在和潜在的竞争者和“不够合作者”。最后，令人不大能够展望或预测未来的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很不清楚“第四代”最高领导怀抱怎样的有其个人特征的政治思想、治国抱负和战略倾向。近两三年来出现了一些间接的迹象，使人大概可以认为他内心倾向以较大力度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而且他相对年轻并有优良的受教育经历，这令人可以进一步比较乐观地期望他怀抱政治创新意愿的可能性。然而，即使那些比较内圈的观察者，业已知道或觉察的也只不过如此。大约 10 年来，在权力愈益集中、权威关切愈益强烈的“第三代”核心领导人之下，他始终采取极为审慎的低姿态，始终是最高领导层内最少个人行为风格和话语特征的人物，尽管对他的智力和情感亲和力，几乎所有同他会晤过的不多的西方人都留有较为深切的好印象，也尽管大多数中国公众相信他有才华但不喜外露、居高位但不贪权势、尚实干而不慕虚荣，这些都属于中国大多数民众在其政治和道德文化传统中喜欢的品质，也是他的很重要的政治资产。

然而，虽然必须做上述种种保留，但它们远非意味着我们无法对十六大以后中国国策的

大致方向、甚至其中许多具体内涵做出比较准确的预计。鸦片战争后的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的确曾经几度以非常重大的国内变革或对外行为（北伐战争、1949年以前的中国共产党革命、1950年入朝参战、60年代与苏联决裂、70年代末发动和90年代初显著加速改革开放）大大影响了东亚国际政治甚或世界政治，但远为常见的是相反的情况，即外部世界的基本状态和重大变动影响、引发、甚或直接或间接地塑造中国国内大局和根本国策。不仅如此，经过20多年改革，在中国社会愈益增进的复杂和自主趋向面前，中国国家的权能与改革前的30年相比已经大为缩减；国家领导层早已从毛泽东和邓小平那一两代的“革命魅力型”变成了行政和技术管理型，他们构思、发动和贯彻重大国策变更的想象力、胆略和主客观政治资源难以同先前相比，他们在政治和政策本能方面的根本特征可以说是高度审慎；与此有关，中国政治文化在实际上带有某种例外性质的毛泽东时代过后，相当程度上已回复到比较传统的保守特质，这和20余年政治基本稳定环境中确立已久的各种利益、习俗和思维方式一起，使得因循陈规和随波逐流往往被自觉和不自觉地当作远比政治和战略创新可取。因此，在讨论和展望十六大以后的中国国策时，我们现在已经或能够认识的一些要素——外部世界和国内社会的基本状况、体制和传统实践（主要是改革开放20余年来逐渐形成的“新”传统实践）的作用、国家不得不应付的难题和风险等因素，大概比当今领导人的交替和他们各自的思想、风格及权势基础特征更重要，甚或重要得多。

实际上，上面说的一切已经意味着十六大前后的国策连续性将远大于变动性。当然，这远不是说不会有局部的重要变动，也非绝对排除更大范围和更大程度变动的可能：外部世界和国内社会某些方面的基本情况已经或正在更改，国家不得不应付的一些关键或较关键的难题在加剧，这些可以成为国策变化的往往决定性的推力或压力。另外，如果“第四代”像仍然颇有可能地那样经过十六大正式接班，并且再经过几年完全、或接近完全掌权，那么他们的某些业已被人们感知的特征、他们同“第三代”之间可能的关系以及他们内部互相间的关系，对于中国较近的未来国策都是很重要的。

## 二

刚才说的一些话特别适合于谈论中共十六大前后中国面对的世界和东亚国际政治环境、对外政策/战略选择和台湾问题，其中早已有之的困难和晚近出现的若干重大变动已经、并将继续使中国领导人面对严峻的挑战。尤其是今后几年台独趋向可能的严重发展，连同与此相关美国的战略态势，或许会使十六大产生的领导班底遭遇一种国务家们一般最不愿意碰上的局面：在或战或和皆大有害的情况下，不能不立时做出是战是和的根本决定。即使情况不那么严重，他们也很可能会比“第三代”领导层多少更尖锐地面对五重挑战：（1）美国空前的霸权性优势和强权政治态势，包括在地缘战略、台湾问题、核武器和军事技术等领域的全面的加剧了的对华战略防范；（2）必将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来的有关的经济不适和冲击，连同广而言之经济全球化的那一部分“煎熬”效应；（3）中国在东亚的中长期安全忧患，它们除美国的对华战略防范外，尤其与日本军力发展和民族心理变迁、朝鲜研发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且自处于国际规范之外、印度国力上升和抱负扩展、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中国威胁”观念广泛化这几大事态关联；（4）台独势力的增强和台独危险的加剧；（5）中国国内从下到上在对外态势、政策和有关思想观念方面的广泛歧异，加上政府尤其在对美关系和台湾问题上缺乏足够高程度的公众赞同和支持。至于这些挑战会在什么方向以及多大程度上推动中国国策的变化，必须在谈论了几个需要预先阐述的基本方面以后，才能予以比较可靠和有较大可信性的预计。

这里要谈论的头一个基本方面，是中国在当今和未来一个长时期里所处的世界政治总体环境。在此不谈其中使得中国政府和大多数中国人放心和鼓舞的有利因素，而只说需要他们全面和勇敢地正视、认真和细致地对待的不利因素。事实上，自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

北约就科索沃问题大规模袭击南斯拉夫以来，他们对于世界总体环境的首要感觉（在很大部分人那里甚至是压倒一切的强烈感觉），便是中国的安全和崛起前景在其中面对或近或远的实在或潜在危险。可以将世界政治总体环境分解为世界基本格局和世界基本潮流，分别从这两个方面来做大框架式的考察和分析。世界基本格局主要指国家间力量和权势的基本分布状态。这 20 余年来尤为突出的大致是这么一个事实：美国及其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共同体在总的力量、权势和大部分功能领域（即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技术、财政、思想文化影响和国际规则体系等）占有非常显著的优势。冷战结束以来的 10 余年内，美国的优势更是多半由于下列四大事态得到了新的巨大增长：苏联瓦解、美国发动和展开信息技术革命、大力进行“新军事革命”以及美国经济在 90 年代大调整和大增长。9.11 事件以后，美国霸权性优势的支配或严重影响范围可以说出现了进一步的跃进式扩展。这首先是因为在恐怖袭击引起的全国性安全恐慌背景下，美利坚民族行使优势和为此承担代价的意愿大为增长，美国大部分公众至少到大规模攻打伊拉克被急切地提上美国国务的优先议程为止，对一个怀抱“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念和极端民族主义、单边主义甚或黩武主义情绪的行政当局给予了“空白支票”式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美国的霸权性优势、特别是在军事领域的霸权性优势之巨大，在我们所知的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甚至超过了罗马帝国。以此相对，越来越可以确认在一个长时期内少有或没有可能形成任何足够经久有力、足够坚强团结的国际制衡阵线。换句话说，先前许多中国人（当然还有许多俄国人、欧洲人和其他人）时常下意识流露出来、或者明确予以宣告的一种希望或信念越来越证明是幻想，那就是在可以明确预见的较近未来，国际政治中能够形成对美国的过大权势的总体制衡；虽然，在一些重要的问题领域甚或地理区域，有时确实可以造就局部和次战略层次上的制衡局面，就像最近通过美国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不得不做出的某些政策修正多少有所表现的那样。

以这么一种力量分布为最大特征的世界基本格局存在着严重问题。美国的巨大力量优势难免导致其强权态势和强权行为，许多其他国家因而缺少在国际体系中的基本自由，世界政治缺少基本公正。就较为柔性、较易容忍或接受的美国“制度霸权”来说，近一年多来特别强烈地凸显的是这么重大现象：霸权甚至在一些关键领域发展到了排斥“制度”、因而造就实在和潜在的混乱的地步。显而易见，在这样一种基本格局中，中国已经、并将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继续遭遇可以因为全球国际体系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而来的各种困难，特别是由于美国越来越着意全面防范和多方阻滞中国力量（主要是军事和国际政治力量）壮大而来的困难，尽管困难的程度可以有变化。

“第三代”最高领导在邓小平“韬光养晦”战略态势的基础上，历经几年过程，大致到 1999 年下半年已明显地确立了一项正确的基本国策：中国在美国的巨大优势面前决不冒失，除非无可避免决不投入与美对抗，也决不将对外政策的根本建立在中短期内构建对美总体制衡的任何企图之上。不仅如此，尤其近半年多来，通过中国方面反复的对美忍让、迎合和主动示好（当然仍有至关重要的“底线”），大力争取美国对华良性态度的政策推行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确实收到了非如此便不可能的某些外交效果。从反复确认“美国亡我之心不死”，到反复强调“对美关系是重中之重”，象征了这个重要的认识、调整 and 适应过程。十六大以后的很长时期内，只要美国政府方面不出现太严重的对华政策恶性变动，中国最高领导层肯定将继续这一基本国策，并且很可能实行得更为连贯。有待优化的主要是，在坚持对美高度谨慎和战略耐心的同时，中国必须尽快地发展改革，加强国力。发展改革意味着在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必要前提下，尽可能迅速地学会先进的管理方式和思想文化，培育最符合时代潮流和人民意愿的社会政治体制以及政治文化。在加强国力方面，一个头等重要、也头等紧迫的任务，在于本着大战略的全局观念，全面和深入地认识中国军事力量的相对严重落后与其各种原因，不受“中国威胁论”的过头干扰，下大决心予以全面的改善和建设。

### 三

当代世界有非常明显的三大基本潮流：全球化、国内社会政治生活现当代化、国际规范（国际法和国际伦理）超越化。就给中国的安全和崛起前景造成的困难而言，全球化和社会政治生活现当代化特别值得关注，当然国际规范超越化、即以愈益增大的范围和程度超越和侵蚀国家主权控制的趋势，也引发和加剧了种种困难，它们尤其来自各类人权问题与军备发展、输出和控制问题上的国际和跨国干预。由于全球化和国内社会政治现当代化这两大具有双面刃性质的基本潮流，当代世界大多数欠发达国家都在经受着可以说往往是巨大、深刻的痛苦：现当代化痛苦。在这痛苦当中，有些来自现当代化转型和冲击中落后国家、落后社会不同程度的严重不适与自我更新能力的欠缺，连同转型的分解、裂变和混乱效应，还有些来自在世界潮流的涌动中按照本国社会实情来选择、试验、推进现当代改造和发展的固有困难，包括寻求既适合时代要求、又适合本国实情的民主化形态和民主化途经的固有困难。此外，这痛苦还包括美国及其他西方强者的往往自以为是的压力，或者说强加西方影响甚至西方模式所加剧的不适和紊乱。

很明显，中国也正在并将继续多少经受着这些痛苦和困难。它们表明，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还包括：在这样的基本环境里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稳定能不能保持？如何以既积极又稳妥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化、法制化改革来使得这些稳定成为真正可持续的？国内的种种有关问题能不能在不引起过大痛苦或震荡的情况下得到解决，而不是仅仅得到“控制”和间歇性的缓解？如何处理这一方面的困难同刚才所讲全球国际力量对比过于严重失衡造成的困难之间的复杂关系，或者广而言之国内基本政策同对外、特别是对美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都与中国的安全、发展和崛起前景息息相关。市场经济改革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负面效应；在中国国内的政治讨论中至今有时仍被强调的种种“西化”“分化”危险；非常棘手的“改革、发展、稳定”三者间关系；“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和一度在党内和国内存在的有关激烈争论；关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新老左翼主义的意识形态分化等等——所有这些都属于在此谈论的问题的重大现实表现。实际上，差不多所有的中国问题观察家都知道，中国政府最关心、也为之最多地耗用精力和时间的是同全球化和国内社会政治生活现当代化密切相关的内部问题，或曰改革开放产生和加剧的种种新型内部困难，而不是任何对外政策问题，甚至一般地也不是台湾问题。“第三代”领导人如此，“第四代”领导人也将如此。

### 四

从东亚区域层面来看，除了前面说过的美国巨大的力量优势之外，中国面对三大长时期的安全环境问题：地缘政治，“安全两难”，“权势转移”。它们规定无论是“第三代”还是“第四代”领导人的很大部分对外政策任务，而且像前面提到的那样，总的来说对付它们的难度正在增大，尽管“第三代”领导人持之以恒的、近乎全方位的睦邻外交已留下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当今中国外交传统或系统经验。

中国处在亚太地缘政治格局的中央，又是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既面对海权压力，又面对现有的或潜在的陆权压力。中国周边有最强大的、并且与之有多种矛盾和抵触的美国，有经济力量巨大、军事实力和潜力令人担忧、民族心理复杂的日本，同时还存在有特殊的强国抱负并与中国有历史宿怨的印度以及越南。与中国相邻的朝鲜半岛、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也包含着难免不时引起中国安全关注的种种因素。从地缘政治构造来看，中国与这些邻居的关系完全理顺是不可能的。在此，还应当提出地缘政治框架中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就这一可称为“最高层次”的军事安全问题而言，中国周边最值得我们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警惕或忧虑的，不仅有美国目前强大得不可比拟的核力量，而且有“核小国”和潜在核国家实在和潜在的核武库，后者在某种意义上对中国更危险。这方面首先是朝鲜违背 1994 年美朝框架

协定在秘密研发的核武器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武库，其次是极个别国家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使用（即通过恐怖主义势力使用）的生化武器。鉴于朝鲜政府自处于国际规范和国际体制之外的特殊性质，也鉴于朝鲜之拥有核武器将造成的多方面非常严重的破坏稳定效应（例如可能引发美朝战争和朝鲜南北战争、刺激日本政界和舆论界内的核武装化欲望等），并且考虑到中朝关系在历史上和当今的复杂性质，应当认为首先竭力依靠外交和经济手段实现朝鲜的可予核查的非核武装化关系到中国的最高利益。中国领导人对此已经、并且应当继续予以高度重视，尽最大可能同美国、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国政府合作，坚决使朝鲜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绝缘。

不仅如此，国际政治的现实和理论都告诉我们，中国避免不了基本的“安全两难”（而且是多项安全两难）问题，虽然可以争取缓解、甚或从很长期的视野看可以争取解脱这个问题。安全两难是国际政治的“心理动力学”，往往成为国际紧张和对立的一大深层动因。中国对一些周边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印度感到不放心是很自然的，实际上也有相当正当的理由。反过来，对于中国国力的腾飞，再加上中国作为“洲级大国”的民族国家规模，周边一些国家对不放心也是真实的和正常的，尽管它们的有些担忧在中国人看来往往简直荒唐，也尽管那里有些势力蓄意地制造和渲染“中国威胁”。对于中国威胁论本身，无论怎样加以解释，都无法消除。至迟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主要是中长期性质的对华疑惧和防范就是决定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对华政策和战略的要素之一，这种情况在今后一个很长时间内大概不仅不会消逝，还很可能有所加剧。近两三年来，中国政府不再像先前那么频繁甚至急切地宣示“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当超级大国”：这实际上说明中国领导人已经明白了这一点，开始对“中国威胁论”的经久性和加剧可能有了长期的心理和思想准备。更近一些时候以来，更有一些迹象提示，他们大概还越来越认识到这么一个道理：中国只有通过同其他有关国家一起，长期性地逐渐创设、培育和形成东亚区域和次区域国际安全体制，才能够逐渐地大大缓解、甚而争取摆脱多项安全两难。否则，中国越是强大，它们的疑惧和防范就可能越是加剧，在安全两难的意义上中国就可能越不安全。

至于国际政治理论中所说的“权势转移”趋势，目前大多发生在中国经济力量发展及其引起的经济实力对比变化方面。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力量有很大增长，综合国力也因此显著上升，这势必引起一些人、特别是一些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担心，而且这种担心有时必然会达到在中国人看来简直荒唐的程度。他们担心甚至确信中国照这样发展下去，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将发生根本变更，从而使得（依据他们的唯能力思维方式，或能力决定意愿逻辑）中国在此前后将全面挑战美国的地位和势力。他们关于过去 500 年的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全部书本知识、他们那种超强国家惯有的过度敏感心理，都使他们相信这一点。除非中国的发展势头夭折，恐怕至少需要一两代人或更长时间才可能基本改变这种观念，或者大大缩小其信仰者范围。而且，对“权势转移”的担心加剧了安全两难问题；而且，“权势转移”还以不同形式存在于中国和日本、甚至中国和印度之间，它们使得中日和中印关系更为复杂化。总之，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因素、传统的国际政治思维、国家间的心理关系因素和“权势转移”问题使得中国在整个东亚区域格局中面临困难多多，问题多多，而且它们都首先关系到中国的长远安全。

“第四代”领导人不仅需要继承其前任近乎全方位的睦邻外交，还必须有所创新或突破。这方面最重要、甚至有全局意义的是大力谋求中日接近。需要本着真正创新性的国策思维和很大的战略决心，主动地以看似重大的代价（或者说依靠对日态度、态势和政策行为的主动的大调整）来谋求中日接近，何况现行对日态势和政策的基本无效更突出了这么做的必要。从至关重要的对日关系本身考虑，而且同时也是从改善中国全局性的安全环境和外交地位考虑，至少非常值得尝试著名的“间接路线”战略（“indirect approach”），或者说迂回战略。

## 五

当今和未来一些年里特别突出、紧迫和难办的是台湾问题。自 1995 年李登辉访美往后至今的多年里，台独趋向令中国“第三代”领导人怀抱的担忧之大，总的来说大概仅次于极少数最突出、最直接地关系到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大忧患。几乎可以肯定，鉴于台独势力众所周知的严重发展，“第四代”领导人在这方面的情况与其前任相比将有过之而无不及。概而言之，中国大陆与台湾当局之间阻独促统对谋独拒统的斗争处于一种不稳定的战略相持状态，战略相持意味着双方各有重大优势，不稳定则是指台湾突破大陆阻独底线的可能性正在增大。大陆当前的优势主要是在总体力量的实在规模方面的长期优势，连同就中国和世界发展基本趋势而言的长期优势。台湾方面目前拥有的优势者大都属于短期优势，它们大致来自（1）台湾民众的心理和认识中包含的一部分情感、偏见和想望；（2）台湾政党和派系政治中的若干因素；（3）美国对华政策和东亚战略中有助于台湾当局谋独拒统的基本成分。

在台湾问题上大陆有长期优势，这是大陆的历史信心所在，也是大陆必要的战略耐心所在，看不到或看不够这种长期优势就很可能犯根本性的错误。但是与此同时，大陆缺乏短期优势，导致在具体和眼前的问题上（它们有是很重大），往往、甚至老是感到无奈或遭受挫折。其主要原因，在于构建某些关键领域的短期优势的努力相当不够，甚至这方面的真正意愿和决心也不充足。就此而言，手段与目的相比、实际努力与义务承诺相比的明显欠缺是迄今大陆方面一项相当严重的大战略毛病，而它很大程度上来自另一项大战略毛病：未能真正在必然有所抵触的诸项价值中间确定绝对必要的战略轻重缓急次序，并且为阻止台独这一应有的对外战略优先，坚决“忍痛”付出必须付出的多方面代价，坚决进行必须进行的多方面努力。大陆如果看不到或看不够缺少短期优势的严重性，并且不去下大决心切实和“只争朝夕”地努力建设短期优势，同样很可能犯根本性的错误。

首先，大陆在改革开放 20 余年来经济已有巨大发展、财政能力已非先前可比的当今，仍然多少墨守在改革开放初期完全必要的严格紧缩和限制军事开支的政策，虽然这一两年来因形势所迫，这方面的情况有了显著的好转；大陆在大部分领域的多方面改革早已进行多年、并且取得了许多大步进展的同时，仍未积极认真地着手改革国防体制和军事机制中不少需要大幅度改革的落后成分。其次，狭义和广义的对台工作虽然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它们在心态、认识、判断和体制机能几方面还有毛病，从而导致相对低效甚至一些比较重要的失误。对台湾岛内民众心理和情感的置身处地式的理解（有些我们可以、也应当坚决不同意，但必须有深切的理解），对岛内政治实情的准确认识，对台湾问题上大陆的目的和手段两者及其关系的大战略式的细致分析与综合把握，都还相当不够。第三，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大陆仍然前进得过于缓慢，这就影响了大陆否则可以有的对台岛民意以至美国国内舆论的影响力，而无论从长期还是从短期来说，这种影响力至关重要。最后，在那些与处理台湾问题直接相关的对美态势、政策和策略方面，“弹钢琴”式的弹性节奏不够，存在有个时期一味“过硬”、有个时期一味“过软”的毛病。近一年多来主要是“过软”。由此，中国似乎未能防止无意中促使美国政府（特别是其中的鹰派）形成一种相当不利的“中国行为模式意象”（那用一位美国著名学者的概括来说是“对华强硬政策业已奏效”），未能防止损伤对美和对台政策所必需的国内公众广泛支持。

短期优势大为不足可能使人在一个个具体的现时问题上反复感觉无奈或遭受挫折，因而渐次失去绝对必要的战略耐心和信心，以至有朝一日可能置长期优势于不顾，鲁莽地投入并非绝对必要和缺乏过得去的成功把握与成本效益的“大拼博”，或者走到另一个极端，即丢弃“台独意味着战争”这一现在已经关系到中国国家全局和国运之精神保障的阻独底线。有如 1999 年末到 2000 年初似乎特别需要防止走前一个极端那样，今后一个时期也许特别需要防止走后一个极端。大陆必须下充分的决心，切实和“只争朝夕”地努力建设在台湾问题

上的短期优势，特别是下决心赶快在资源投入、国防体制和军队机制改革、武器系统发展和部署、部队官兵素质全面提高、军事信条和战略文化当代化、战备决策机能和战略规划合理化、国防教育提高和普及、国民战斗意识的准备等各方面加强军事力量的建设和改善。应当说，这是“第四代”领导人应当确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所要求的首先他们的胆略、毅力、战略眼界和政治技能。

台湾问题如果搞糟，就会增添很多变数，其中有些或许是接近致命的。一方面，在现有的世界基本格局中，在美国的巨大优势下，要有比较好的民族心态，绝对不能把中国的基本稳定、基本安全和远大前程赌掉、拼掉了。因此，要有战略耐心，不作孤注一掷的“大拚搏”，以阻独而不是其他作为台湾问题甚或当前对外战略的最优先、最重要目标，据此进行必要的调整，并且为此付出各方面必要的代价。另一方面，如果台湾方面跨过2000年初大陆宣布的动武“门槛”，就必须有动武的战略决心和战略准备，为此也必须事先进行必要的调整和付出必要的代价。在台湾问题上，大陆的战略是不是有些模糊，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客观地助成了某些势力对形势的错误判断？是不是应当再明确一点？对这些问题可以有不同的判断。（就近来的两岸关系而言，最引人注目的事态一是陈水扁发表“一边一国”讲话，二是两个月后大陆方面表示不以“一中”原则为两岸直航谈判的前提条件。这后一举动是否将显著有利于陈水扁和仍然保持台独党纲的民进党对于“泛蓝联盟”的政治地位？是否将在大陆经得起长久等待、而台湾远非如此的“三通”问题上导致陈水扁能解脱愈益加强的岛内舆论压力？是否模糊了大陆前此对陈水扁的台独立场的强烈批判和警告？对这些问题，同样可以有不同的判断。）然而无论如何，只要是对人民、对民族、对国家负责的中国领导人，就必须坚守阻独底线，并且以清晰无疑的庄严声明和备战行动反复表明“台独意味着战争”。至于对美战略，一般地说可以、也必须有其相当的模糊性，规避某些可以、也应当规避的锋芒，为自己保留尽可能大的战略和策略回旋余地，但有一点例外，那就是坚决表明“台独意味战争”。

## 六

十六大以后，中国领导人有没有**充足的**“广义资源”来对付他们面对的种种外部困难或挑战？还没有，因为从大战略的全局观念出发观察和思考，可以发觉尚有六项主要的欠缺。下定决心，非常积极而又足够稳妥地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弥补这些欠缺，是新领导人应有的大战略职责，也是对他们真正严肃的挑战和考验。

第一，中国尚待建设一个即顺应时代潮流、又适合本国实情的民主政治体制，更有待培育和形成进一步的民主政治传统，它们能使国家真正具有大致全面的现当代效率，能大有助于保证社会真正可持续地稳定和富有活力，能显著加强亿万中国人——从最高层领导到最基层公众——在当今世界的自信心，并且能使中国相当广泛和有力地朝积极的方向逐渐影响美国国内对华舆论，减轻美国对华政治压力，同时大大增强阻独促统事业对于台湾公众的影响力。

第二，中国尚待真正形成足够长远、连贯和宏大的外交哲学和世纪性大战略。这是有效地追求中国应有的国家根本目标——基本安全、基本富裕和争取逐渐成为世界强国——所必需的，并且大有助于对付中国面前严峻的外部局势。而且，对外基本态势的坚定、明确、连贯和必不可少的战略耐心，应当说正是来源于此。

第三，中国还远未建设成功一支足够强大的、全面地现当代化的武装力量，并且相应地比较欠缺在下面两对关系问题上足够辩证、足够切实的大战略认识和方针，那就是（1）发展经济与加强军力的关系，或曰“黄油与大炮”的关系，（2）大大加强武装力量之物质建设与显著改善其非物质素质（包括其结构体制、运行机制、战略战术信条和广大军队成员的现

当代素质在内)的关系;应当说,大力弥补这个欠缺大概已经到了近乎不容延缓的时候。

第四,中国比较欠缺如此的国家安全决策体制:它能保障合理、迅速和有效地处理对外关系中的重要事变和危机事态,形成国家大战略和外交、防务等分支战略,统一指挥和协调战略实施和危机处理,而且做到既高度体制化,又在必要时灵活机动。它还能及时地进行战略和政策的审视、调整和创新,同时经体制化保障而能充分有效地集思广益,并且塑造在大战略、战略和政策等各层次上尽可能广泛的共识,特别是较高层的共识。

第五,中国政府还未较多地积累起一种在当今已很需要、未来将更加需要的当代大众政治经验,即积极、灵活地呼应、调控、引导和教育公众舆论,同时调控、引导和管束往往形形色色的部门利益及其局部观念,以便有利于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实施,并且维护和促进国内的有关共识和团结。

第六,中国政府在对外战略和政策方面,对于“事在人为”这一大道理的认识还不很够,心理上、思想上和实践中的积极主动性也因此而不够,虽然近一年来已有了显著的进步;也因此,尚待更积极、更自觉和更经常地总结经验教训,设想、试验、修正、贯彻得以尽可能最大程度地朝有利方向影响甚或塑造东亚局势、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走向的创造性政策。

## 七

对付中国面临的外部困难不仅是中国新领导人的责任,也在同样大的程度上是中国公众的责任。或者说,这些外部困难同样是十六大以后中国公众必须负责任地迎接的挑战。在这方面,一类特别重要的问题是许许多多中国人那里存在两种不同心理(或许可以称为两种民族心理),它们都在颇为严重地妨碍形成和贯彻有效的国家战略,都可能给中国的应有崛起带来重大障碍或风险。

一种心理或许主要存在于收入较低、受教育程度较低或在改革过程中遭遇较大个人困难的人群中间。它的特征,在于过度的国际“受害者”、“受困者”情结和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简单、粗糙和片面地看待中国面对的外部困难,缺少大战略的全局观念和对国家根本目标之经济、外交和政治工具的重要性的理解,缺少历史信心、战略耐心和战略思维的起码精细性。持有另一种心理的人大概主要集中在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较高、在从改革过程中得到较多实惠以及个人对外联系较多的人群中间,而且主要分布在沿海的经济较发达城市。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对中国外部环境和对中国国运的态度和看法相当大程度上“经济化”、“个人化”了;说得不客气些,这些人不怎么关心中国的安全环境和基本国运。他们中间还有一部分人虽然对这些考虑得较多,有民族国家关切,但同样缺少大战略的全局观念,多少怀抱“外交万能”的片面观念,缺少对于国家目的之军事工具的重要性的理解,连同对于外交工具的内在丰富性或外交策略的多选择性的认识,并且缺少战略决心。这两种心理都不是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应有的、健全的心理,但它们在当今中国人中间分布得相当广泛,影响也相当大,而且将是困扰中国的长期历史性问题之一。实际上,即使环境再困难,如果民族心态比较好,既有历史信心和战略耐心,又有战略决心,中国的未来就大有希望。

(2002年10月成稿)

